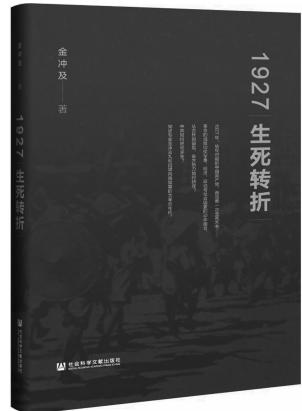


# 万类霜天竞自由



95年前的中国，究竟是一幅怎样的图景？中国共产党成立6年方才不久，经过改造的国民党在3年前召开了一大，北洋军阀的势力仍很庞大，来自英、美、日等列强的影响若隐若现，而经过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的名义深度介入中国的政治运作。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巴黎和会失败与五四运动激荡的古老中国究竟该往何处去？著名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在年逾九旬之际，又推出《1927：生死转折》，以高屋建瓴的宏观视野、有别于他人的有关史料、生动简约的考究文字，勾勒出这一大浪淘沙物换星移的特殊年份，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金冲及笔下的1927年，客观扼要言不烦地写出了各种力量的生死较量历史转折。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以陈独秀、李大钊为首的共产党人积极探索不断寻求中国的出路与解决方案，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开始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具体的合作方式在现在看来，也许见仁见智，但在当时，也是一种时势使然、积极摸索。当时的共产党年轻新锐，但经验不足，对国情、党情、世情的认识也不足；而国民党成分复杂，派系多多，尤其在孙中山于

1925年去世之后，廖仲恺遇刺，蒋介石逐步崛起，汪精卫、胡汉民等国民党中央坚持也咄咄逼人能量很大。在如何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又不丧失原则立场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上，过去多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尤其是最终酿成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但还是过于概念化、简单化，金冲及依据大量史料、当事人回忆、尤其是来自国民党的有关记述，尽力复原当时的历史现场，凸显历史的复杂，把蒋介石的步步试探、国民党内的力量博弈、共产党内的意见分歧、共产国际的越俎代庖扼指气使等等一一展现出来，简明扼要，提要勾玄，令人印象深刻。书中提到了蒋介石的心中无底、色厉内荏、步步试探，也写出了共产党人陈延年、周恩来、毛泽东、蔡和森、罗亦农、赵世炎、苏兆征、张太雷、任弼时、董必武、李维汉等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的积极努力勇于反击，令人清晰明白地知晓八一南昌起义的爆发、八七会议的召开的确是生死关头的重大转折。

金冲及笔下的1927年，并不局限于党内的斗争以及与国民党的生死较量，还以宏阔的视野展示出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激烈博弈。金冲及先生就北洋军阀中的直系、奉系、还有直系色彩的孙传芳进行了客观反映。共产党召开党的五大之时，正是张作霖绞死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日。奉系当时在中国北洋军阀中的力量最为强盛，但直系与北伐军的交锋最为直接，而割据东南五省的孙传芳颇有坐山观虎斗指望渔翁得利的如意算盘；即使在北伐军内部，也是各种力量风起云涌龙争虎斗，李宗仁、白崇禧桂系的崭露头角，程潜部下唐生智的风生水起志得意满，北方冯玉祥队伍的不断壮大，更有国民党内部各种派系之间的激烈较量，汪精卫在1927年4月10日自欧洲返回中国，这一番纷纷然然各种组合真是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伴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广州作为

□王振羽

革命中心已经不合时宜，是迁往武汉，还是立足南昌？是经略东南，掌握上海，还是一路北伐，直抵北京？蒋介石也好，胡汉民也罢，西山会议派也好，国民党左派在其中也是呼风唤雨，不容小觑。汪精卫的慷慨陈词，陈独秀的委曲求全，孙传芳的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的以退为进被迫下野，更有南京的龙潭之战，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与孙传芳的殊死搏斗，武汉汪精卫等与蒋介石的分分合合最终宁汉合流。金冲及先生把各种力量对比，把国民党谋定而动的阴谋，各种潮流与暗流的涌动，把一些似乎被遮蔽的历史人物的独特作用，如唐生智、邓演达、黄郛等一一彰显，把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彻底决裂，说得透彻明细，一目了然。自此以后，第一次国共合作就真正戛然而止，大革命彻底失败，中国历史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金冲及先生研究解读1927年的生死转折，但并不拘泥局限于1927年，他提到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把它与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相提并论，称之为“巨大的历史灾难”。但众所周知，大失败之后并不是一蹶不振偃旗息鼓，而是跌倒重来，置之绝地而后生。1927年的大革命失败，当时的共产党人在失败中奋起探索出农村包围城市的独特道路；1934年的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随之召开了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成为党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样的转折，绝非偶然，探讨其中的关节，重温当年的历史，汲取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一个百年大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至为必要、不可或缺。

已经92岁高龄的金冲及先生祖孙三代都是史学名家，他主编有《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著有《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都是影响巨大的党史文本，也就此奠定其当之无愧的党史研究名家地位。

## 古人生活跃然纸上

□甘武进



侯印国 著 [清]佚名 绘

2022年7月  
上海科学出版社

对中国古人的日常生活，不少人的认识常常停留在古装影视剧里。顶戴花翎、马车、轿子等古装剧中的元素经常给观众留下特别印象，但很少有人会深究剧中的服饰等存在的合理性。实际上，有些作品对古文化的考究不严谨时有发生，导致许多观众在认识上被误导。《过日子》这本书以彩绘图的形式，让古人的日常生活跃然纸上，让我们从他们日常的衣食住行乐等方面，窥见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脉络，也给我们带来了不少有趣的见闻。

本书搜集了不同地区馆藏的外销画以及图册，分别从衣食住行乐五个方面，全面地展示了当时人们的生活场景。各行各业的人的衣着、做饭用的灶具、家具摆设、车马船，甚至是乐器都有涉猎。力求在更广的背景中，还原古人丰富有趣的日常生活与风俗习惯。在展示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生态“全景图”的同时，本书也侧面探寻挖掘了这股席卷西方世界的“中国潮”。以直观的方式，向读者展示了优秀深厚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对西方世界的影响。

1757年，乾隆皇帝要求西方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广州为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使中国艺术品通过贸易大量进入西方，引发“中国风”的热潮，也催生出了独特的外销面。这些画作大都由广州十三行的画家们用西方绘画的技术画成，但同时又保留着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形式，其形式包括纸本水粉画、线描画、通草水彩画、布木油画、玻璃画等，题材类型则极其广泛，堪称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自然生态的“全景图”，其中展示市井生活和手工业制作的作品体量最大。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的本性，但衣不仅代表了衣服，也代表儒雅的外表，衣使得人和兽有了区别，故而把衣排在第一位。书中关于衣一章，收录了二十五幅外销画，描绘了官员、理发师等各行各业从业人员的服饰，也描绘了不同社会女性的穿着，对于研究社会各阶层服装特点提供了可参考的史料。

家具是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器具。中国室内家具以木材为主，也用竹材和其他材料，类型丰富，形式多样。书中的家具陈设系列图，每样物件看起来都很美，风格多为端庄、典雅，展现匠人工艺的高超。如架子床，是四面有柱子承托床顶的大床的统称，它有多种形态，四角设四根木柱，顶部设有四根横杆，称为“四柱床”；正面两侧多设两柱为门，叫做“六柱床”，书中所绘就是六柱床：床的四周门围子和顶部的床楣有镂空雕花设计，牙子上有精美的花纹。

古人使用的炉具、书架、椅子、船只、轿子、唢呐……从百姓的日常服饰到饮食起居的各种物件，本书为我们细数了数百件在几千年历史发展当中承载着中国历史文化变迁脉络，却又逐渐消失在我们日常视线当中的器具。文字的通俗与趣味性，配合百余幅丰富精美的手绘插图，生动演绎了中国古人生活的丰富多彩，为读者带来一缕绵延百年的自在烟火气，加深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与理解，收获一份知识与力量。

# 孤独的“局外人”



当周洁茹再一次进入文坛，笔下的世界就变样了，不再是20岁时的迷茫和稚嫩，《你疼吗》《干点什么吧》这样带些单纯的忧伤和青春期哲思的话语，被置换成生活在新港、香港和国外的移民在文化冲突下的艰难、百无聊赖和说不清道不明的疑惑。《美丽阁》的语言简洁、冷漠、客观，形形色色的故事仿佛在剧院上演的人生话剧，戏剧性的冲突被作者用手抹平，缓慢的生活节奏和无波澜的情节成为展览的主要内容，人物的对话频繁且细碎，缓缓流过，难以留下痕迹。而读者就像站在剧院外观看的路过者。

内地去往香港的师奶在婚姻和社会中尴尬的处境，移民想要融入新社会文化而不得反遭人鄙弃的痛苦，金钱和权力对人的异化等，当下社会赋予人特别是女性的重压和险阻，都走马观花般在眼前过了一遍。但因短篇小说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的缘故，作为读者的我总与主人公“我”相重合，内心的毫无波澜和提线木偶般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处理方式，使得生活的喧嚣和

尘土虽从“我”身上漫过，却难以激起“我”内心情感的半点波动和起伏，对于作为读者的我来说，也同样如此。

以对话展现生活的流动和散漫，在这一叙事手法的运用上，《美丽阁》与吴亮的《朝霞》非常相似。对话大多围绕着生活琐事展开，每个人都在对话中透露着自己在生活中和心情上的愉悦或不快，又在话语中隐藏着自己不愿透露的心事。与《朝霞》中人物对话渗透着人与人之间的友善与和谐，弥漫着哲思与时代的忧虑不同，在《美丽阁》中，人与人之间似乎隔了一层膜，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隐藏的秘密和隐情，亲情、友情和爱情被包裹得不向外溢出半分。这样带着隔膜的写作方式，总让我想起加缪的《局外人》。“我心里是这样想的，但我没有说。”书中常常出现这一句话。“我”总是不赞同朋友说的一句话，或对眼前的某件事感到不满，但最终往往会选择默默承受。“我”站在旁观者的角度观察这个世界，观察我身边的每个朋友，观察发生的每一件事，却很少做出价值评判。每个人都在社会这一海洋中沉浮，每个人都对不公平的生活感到麻木且理所当然。作者并不对主人公以及身边的朋友进行深层的心理描述，第一人称视角和零度叙述方式的结合，使得“我”和莫尔索一样对这个荒谬的世界冷眼旁观。米线店里没有厨师做饭，所有人仍然坐在店里一动不动，没有人催促，也没有人离开；“我”晚上乘坐公交车回家，司机开过站了，却没人对此做出反应，任由司机将“我”带往不知名的地方；“我”在等电梯时，“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被她的工人紧紧挽着，紧紧地挽着我”，“马上又来了一个戴帽子的老太太，连工人都长得一模一样”。荒诞且夸张的细节填充进冷漠的叙事语调里，怪异荒唐的当下社会现状在放大镜的映照中无处遁逃。

在《和维维安一起爬山》等几个短篇

中，“我”也有正常的情感在细节处流露，如维维安多次爽约，“我”虽不愿意爬山，但对她的行为仍比较生气，故而说“我”只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吃一点辣椒，说完便往素汉堡上撒了一些。表明“我”并非完全摒弃了情感，相反，这与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共同构成了“我”对于这个荒诞世界的疑惑和不解。《你疼吗》表达的是周洁茹对女性的身体和命运的疑问，《美丽阁》呈现的却是作者对当下社会和生活给人造成的异化和困苦的不解。时隔十一年，作者依然在文本中不停地发出“为什么”的疑惑，却始终在思索答案、寻找答案的路上。与《局外人》中莫尔索经历精神冲突和斗争后，在宗教中找到了皈依，最终脱离“局外人”的身份不同，“我”没有找到出路，也找不到答案。“我也没有自己的地方，我补了一句，总有一种寄居地球感。”作者在《布巴甘餐厅》中发出这样的感叹。流浪感、漂泊感和不稳定感在小说中无处不在，作者在凝视新移民和女性的社会处境的同时，也为自己包裹上孤独的外衣。“我”在异地的文化冲突中艰难生存，远离故土，不管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处于漂泊无依的状态。这给了“我”便于观察社会的距离感，也让我处于孤独无援的状态。

“局外人”总是孤军奋战的。世人依旧在承受尘世的重压和生活的艰苦，即便是“我”想做一个“局外人”，也囿于俗世无法自拔。“我”只能是一个陷于其中的“局外人”。而在这样带有陌生化效果的呈现方式中，作者隐藏了“我”的思想痕迹，以及与他人的情感和心灵交流，深层的思索少有。如《51区》这样对人物处境的叩问而引发的哲思在其他短篇中并不多见。第一人称与零度叙事方式的结合，使得小说仅仅停留在呈现生活的表层上，却难以见“我”内心斗争和思索，人物的灵魂塑造也就被埋没了。

□周薪璐